

# 第 1 章

## 绪论：学术史的回顾

明末以后来华基督教传教士是一个身份复杂而奇特的群体，研究者对其历史功过的评价经历过几次大的转折。新中国成立前的学者大多是以肯定和赞许的态度看待西方传教士对中西文化交流所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受政治挂帅路线的影响，学界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的姿态，将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认定为一种文化侵略。至于近年来的研究，何兆武指出，学界“似乎又再反其道而行，一味颂扬西方传教士的贡献而置整个历史潮流的大趋势于不顾；似乎唯有这批代表中世纪传统的反改革的旧教传教士，才是这一时期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代表人物”（何兆武，2007：前言：2）。我们认为，虽然近年来学界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并非何兆武先生所说的那般呈一边倒之势，但是从他的观点中不难得出我们研究历史所应持有的态度：深入挖掘历史事实，结合历史事实发生的环境分析当事人的功过。

晚清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因其在鸦片战争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使得后人对其历史功过难以定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传教士扮演着宗教传播者、殖民侵略势力的同路人和文化交流使者等多重角色。他们在华期间对待相关重大事件的立场态度和所持言论与其传教士身份多有违忤。他们的某些作为跟来华之初所抱有的传播福音、发展信徒的单纯目的也相去甚远。然而，一个基本可以认定的事实是，除传教以外，他们在来华之初所着力从事的教育、出版两项事业，确属来华之前就

已由派遣教会交代的“分内”之事。<sup>1</sup>而这两项重要事业，都与翻译密不可分。

在19世纪初，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约三分之一，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影响极深，汉语又是在东南亚各国华裔中广泛使用的语言。基于这些考虑，中国以及华语覆盖的南洋地区就成为了当时新教传教的重要目标地区之一，将《圣经》翻译成使用人口如此众多的汉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优先考虑。自1807年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起，到1850年止，新教来华共有传教差会17个，传教士141人。这批早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以及气候和卫生条件等诸多不适，在晚清严厉禁教或限制传教的环境下开展“地下”传教活动。若单从发展信徒的数量来看，其事业很难用“卓有成效”来形容，甚至称不上“差强人意”。<sup>2</sup>但若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几十年的活动，则其贡献相当巨大，其影响相当深远。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在19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的作用还乏人问津，但他们却是这一领域最活跃的角色”。“他们的切身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当了中西方的沟通渠道”（费正清，2006：92）。他们打开晚清帝国封闭紧锁的国门，迫使中国接受西方文明洗礼，进而步履蹒跚地走向了现代化。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在华期间所做工作不仅仅是传教，甚至可以说主要不

---

1 从Leonard（1899）一书的叙述看，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时间，与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基本同步，其进程与所遭遇的问题也基本类似，但比印度等国稍晚。各教会已经通过在印度等地的传教得出一个经验：初到一个国家，例如印度，由于传教往往被禁止，传教士都只能从事语言学习与教育、《圣经》翻译与印刷等事务。正是这种早已取得的经验，使得伦敦会和美部会在派出马礼逊和裨治文等先驱传教士时就做出这样的交代。

2 鲁珍晞指出“尽管基督教投下大批的人力与财力，他们在使中国归向基督教这个首要目标上却失败了。在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数从未超过百分之一的人口，而到了20世纪中叶，传教士的工作被迫中止。”（鲁珍晞，2000：11）

是传教。他们还在教育、出版和医疗等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而教育和出版所包含的一件重要工作便是翻译。

的确，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一开始就与翻译密不可分。无论是西方文明的输入，还是中国文化的输出，翻译都是传教士所依凭的重要手段。不论是英国最先来华的马礼逊，还是美国首位来华的裨治文（E. C. Bridgman），教会在向他们交代传教使命时，均将《圣经》翻译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sup>3</sup>，而他们实际所事翻译工作则远不止于宗教文献。从早期的马礼逊和裨治文到较晚的傅兰雅（J. Fryer）与李提摩太（T. Richard）等，一批批来华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工作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除宗教文献外，其翻译所涉范围涵盖政治、社会、哲学、军事和自然科学。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都与新教传教士担当主角的翻译事业密不可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百多年后学界对这一批传教士的总体研究并不充分，以至于费正清在 1985 年不无遗憾地指出，“在 19 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虽被研究得最少，但却是最为重要的角色。”（Fairbank, 1985: 2）<sup>4</sup>至于传教士的翻译工作，特别是对中国文献的英译活动，研究者所给予的关注更是微乎其微。

从文化交流层面看，肇始于两百多年前的这场新教传教运动，是新教徒将其自认为优越的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强行灌输给中国这个东方帝国的一次努力。众所周知，在这一文明灌输行动中，不论中国一方如何消极应对或顽固抵制，中国文化终究是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意义同等重大但一直未受重视的是，正是通过这批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西方在最热切渴望了解中国的关键时期得到了他们所需的知识和

---

3 例如，伦敦会做出决议让马礼逊前往中国时，指示其具体目标是掌握中国语言文字，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4 雷孜智（2000: 7）指出“费正清在 1985 年所做这一结论今天仍然正确”。

信息。新教传教士英译中国文献的文本选择范围涉及中国典籍、通俗作品、官府文件、时事报道，等等，他们所编写的一大批工具书和汉语学习读物，其中许多也含有大量的汉英翻译成分。一些传教士甚至还应邀为中国官员翻译政府通告和书信等文件。可以说，这批新教传教士与同时期的相关外交官和汉学家一道，将中国文化与国情较成规模地输送给了西方世界，充当了那个时代中西方沟通交流的桥梁。

有研究者将 19 世纪那批专注于中国文化的英文译者和学者视为一个小群体，该群体虽然“人数不多，影响不大，常为人忽略或受人揶揄”，却仍然在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敏锐地及早发现了一批重要的中国文献，领会到了这些文献的文化价值，并为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些文献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葛锐，2012：242）。例如，就英国来华传教士而言，他们作为中国文献的第一代英译者与斯当东（G. T. Staunton）、德庇时（J. F. Davis）等外交官一道，通过其译作与著述形成了英国汉学的雏形。

鉴于这批传教士英译中国文献活动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以及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缺乏重点关注的状况，本书将以相关原始史料为基础，借鉴基督教在华活动史、翻译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相关成果，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活动的总体情况做一全面整理和分析。

对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英译活动的系统研究，需要涵盖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梳理翻译原始状况的翻译实践史，即哪些传教士、在何时、为何种目标读者、从事过哪些翻译活动？其翻译具有什么特点？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二是翻译思想史，即这些译者直接表达过什么样的翻译主张？他们的翻译实践间接反映了什么样的翻译思想？三是断代思想史，即决定传教士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的中西时代背景、时代思潮以及基督教在那一阶段的教义特征等。本章将追溯 19 世纪以来中国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学者对以上三个方面所做研究的情况。

100 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和宗教界对 19 世纪基督教在华活动史的研究，重点关注于后半叶。对于他们早期在华期间立足未稳、筚路蓝缕的开创性工作，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史、中国翻译史以及部分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的个案研究。本综述将回顾相关研究，指出其为本课题研究所提供的文献基础和方法启示。对于记录和反映在华新教传教士活动的档案资料，在此不做综述。

## 1.1 英美相关研究

近代新教传教士绝大多数来自英美两国，西方从事在华新教传教事业研究的学者也主要集中于这两个国家。两国研究者对来华传教士有关英译中国文献的直接研究主要是有关书目编纂，附带性研究则散见于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著作对有关翻译活动的零星记叙。或是囿于视野，笔者目前尚未见到以来华传教士翻译活动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系统性成果。

### 1.1.1 书目集纂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发表过非常丰富的中英文以及其他语言的著述，而最先对这些著述进行整理的是卫三畏（S. W. Williams）。他在《中国丛报》第 18 卷（1849 年）《中国研究著作目录》一文中，对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著作进行了全面分类整理，其中包括中文书籍译本 50 种（其中英文译本 13 种），并对其中部分译作的翻译质量做出简短评价（S. W. Williams, 1849）。随后，伟烈亚力在众多同仁的帮助下，编辑出版《1867 年以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一书（Wylie, 1867）。书中除各传教士的小传外，还“包括了自新教入华以来几乎所有已出版的传教士著作”。虽然“遗漏难免”，但是作者相信“重要著述定无遗漏”。这是一部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后

人对这段时期内传教士著述的研究（如 Tsien, 1954; 熊月之, 1994; 吴义雄, 2000a 等），大多以此为参考依据。19 世纪另一个重要的相关文献汇编是《中国书目手册：有关中国的书籍与文章清单》（Möllendorff, 1876）。该书第一大类“汉语语言与文学”第五部分是汉语文献的西译书目，在时间和著译者覆盖范围上超过伟烈亚力的书目，而且克服了伟烈亚力只收书籍不收文章的缺憾。考狄（H. Cordier）的五卷本《中国书目》（Cordier, 1881—1924）是西方自 16 世纪中叶至 1921 年左右关于中国著作的汇总，包括用各种欧洲语言撰写和翻译的有关中国的专著与文章，甚至于报刊上的启事和书评等。该书目虽然原则上只收录正式出版的文献，但有时也列举未刊抄本。这是西方关于中国研究的一部大型总揽，所摘录的论考约有一万余项。

除上述书目汇编外，西方还有分国别和藏书地点编纂的书目。较具代表性的有《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士研究图书馆书目辑录》（Chu, 1960）和《1850 年以前西方关于中国的著作》（Lust, 1987）。前者由 Clayton H. Chu 根据纽约传教士研究图书馆（Missionary Research Library）所藏文献，依主题分类整理而成，编成书目共三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 1960 年印行，惜所录文献仅限于美国；后者则是由勒斯特（J. Lust）根据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馆藏编纂而成。

单个地看，以上几个书目都因编纂时间或范围的局限而存在收录不全的情况，但将几个书目合并考查，则基本上能反映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英译中文文献的全貌。这是本研究所依凭的一个重要基础。

### 1.1.2 在华传教史及文化交流史著作

关于这一时期新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资料，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传教士所发表的著作；二是后来的研究著作。这两类著作对于研究传教士从事汉英翻译的背景和动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伦敦会传教士米怜早在 1820 年就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出版《新教在华传教最初十年之回顾》，详尽记叙最早来华的伦敦会先驱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和麦都思 (W. H. Medhurst) 等 1807 年至 1819 年间在广州、马六甲和新加坡等地的活动，并有对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等的评论，大量文字述及汉语学习和翻译。书中所保存的马礼逊和米怜的书信、日记和一些统计资料，成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Milne, 1820)。《新教第一个中国差会的开端》(Morseley, 1842) 阐述了伦敦会为汉译《圣经》而派遣驻华差会以及《圣经》翻译的过程。书中收录大量书信，是了解伦敦会和马礼逊等人传教思想和翻译思想不可多得的史料。

其他一些重要的新教传教士的英文著作从不同侧面记录了他们及其他传教士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传教活动，重要的著者有郭实腊 (K. F. A. Gutzlaff)<sup>5</sup>、麦都思、卫三畏等。郭实腊的《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前言部分介绍了中国的政策和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其《开放的中国》(*China Opened*) 则详尽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地理、历史、风俗、艺术、商业以及文学、宗教的认识。跟郭实腊一样，麦都思也是著述颇丰的传教士，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汉英翻译作品。他于 1838 年出版《中国的现状与未来》(Medhurst, 1838)，记录了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及“南洋”的活动，以及他和美部会传教士史蒂芬 (E. Steven) 于 1835 年在广州等地传教的情形。这些早期活动对于他中国观和翻译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卫三畏的《中国总论》(S. W. Williams, 1848) 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专著，被誉为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该书特别注重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这种认识对同时期及后来传教士的汉英翻译有着重要影响。

---

5 相关文献关于该传教士的中文名很不统一。其德文全名为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英文名为 Charles Gutzlaff，中文名则至少有郭实腊、郭士腊、郭实立、郭实獵、郭实猎等。本书对其中文名采用现在学界比较通行的“郭实腊”。

由裨治文创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 19 世纪上半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最重要媒介，它所设栏目覆盖了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各个方面。传教士通过《中国丛报》介绍中国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是翻译，1851 年之前他们所从事的翻译活动的成果，几乎都在《中国丛报》得以刊载、介绍或评论。因此，《中国丛报》是本研究极为重要的资料与资料线索。出版于 19 世纪末的《十九世纪传教年报》(Leonard, 1899)，在追溯基督教历史的基础上，将基督教传教事业置于全世界重大事件背景之下，基本上以 10 年为单位叙述了基督教在全球的发展，书中有不少独创性的见解，该书为本研究的有关分析提供了宏大背景。

20 世纪也出现了一些关于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重要研究著作。季理斐的《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MacGillivray, 1907) 详尽介绍了新教各派在华活动历史，按教派独立编排，并罗列了许多重要的统计资料，成为了解各教派在华传教事业发展脉络的重要工具性资料。书中对每一教派的介绍中辟有“文字工作”，其对各传教士所从事的翻译工作特别是汉英翻译工作的记叙虽不详尽，但也是本研究重要的研究线索。对本研究而言，该书最大的缺憾是在所附著述目录中未收录译著。此外，书中所提供的信息有一定错误。《美中早期文化接触》一书(Danton, 1931) 对新教早期来华传教时期的英美政治与社会思潮、赴华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的教育背景、语言能力、性格特征、政治立场、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等有详细介绍和精辟分析。这些内容对于分析传教士译者们的选材标准、翻译策略等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钱存训于 1954 年发表的长文《西学翻译对中国的影响》(Tsien, 1954)，在第二节“新教传教士与翻译”中讨论了新教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近代的影响。这是西方书刊中极少的将传教士翻译活动单列的研究，虽因研究主题所限而未提及中学西译，但他对这些译者翻译活动的旨归、选材和方式方面的分析，对笔者有重要启发。20 世纪 60 年代后，费正清呼吁重视传教士

研究并完成多种有关传教士的著作，并与巴内特（S. W. Barnett）主编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著述》（Barnett et al, 1985），书中论述了包括梁阿发在内的几名主要早期传教士的著述情况，但主要研究的是他们的中文著作。张格物（M. A. Rubinstein）《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开端》（Rubinstein, 1996）<sup>6</sup>一书则专注于 1807 年至 1840 年间传教士的活动及其演变过程。虽然全书极少论述汉英翻译活动，但该书在档案材料的利用和对有关情况的深入分析方面，对本研究有重要参考意义。

进入 21 世纪，西方学界对在华传教士研究明显加强，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一、在史料挖掘和利用的广泛性上有了较大突破；二、借鉴了相关学科成果，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获得了新的研究视角，因而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上均有重要进展。例如，《传教士写作与帝国》（Johnston, 2003）通过考察伦敦会所发表的传教士著述和译作，深刻分析了处于宗教利益和帝国利益交织中的传教士之矛盾心理，对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传教士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虽然该著的研究对象是伦敦会驻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地传教士，但其分析和结论基本上适用于在华教士。博士论文《鸦片推销与圣经走私：英国在华帝国野心的宗教与文化政治》（Fischer, 2008），是传教士著述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用现代学术概念解读了 1795 年至 1845 年间在华新教传教士英文著述的动机及其传播与本土反应，阐释了传教士写作与大英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他们在中英交流中所起到的关键沟通者的作用。该文对传教士创作心理的深刻分析，是其诸多亮点之一。遗憾的是未将传教士汉英翻译纳入主要的讨论之中，而只是略有提及。而《西方遭遇东方：斯当东对英国中国观的影响》（Eastberg, 2009）则是一部对汉英翻译有重点关注的博士论文。作者阐述了斯当东的著作和译作在 19 世纪英国中国观形成与变化过程中的作用，对斯当东所译《大清律例》的

---

6 该书脱胎于作者 1976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Zion's Corner: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27-1839”。

作用做了重点分析。虽然斯当东本人并非传教士，但他与传教士往来密切，书中对他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描述，以及其翻译活动对其中国观的影响，对于本书分析同时期传教士翻译活动是重要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述各项研究，有一部分是由基督教教内人士完成，因而难免有美化基督教的成分。例如，赖德烈作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和海外传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其观点很难超越教会史模式，经常夸大基督教和传教士的影响。而且许多地方表现出“新教偏见”（王立新，1997：21）。

### 1.1.3 传教士传记

传记就是历史。周振鹤在“《基督教传教士丛书》序言”中指出，（传记所记录的“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周振鹤，2004：1）。17位从事过汉英翻译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大多有回忆录或传记，其中马礼逊、裨治文等更是有多部传记。这些传记或回忆录大多由传主的书信、日志、日记和文件等一手材料构成，因而成为研究传教士活动的珍贵资料。

马希曼（J. Marshman）是早期赴印度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在《圣经》汉译和中国文献英译方面做出过开创性贡献。关于他的传记有《马希曼传略》（Fenwick，1843）以及一部合传《塞兰坡传教士凯里、马希曼和沃德生平及传教工作》（Marshman，J. C.，1873）。

作为新教来中国传教的第一人以及最重要的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所得到的关注自然也最多。关于他的传记，最早者乃是其遗孀所编著的《马礼逊回忆录》（Morrison，E.，1839）。此后至少还有《在华传教士先驱马礼逊》（Townsend，1891）、《一代宗师马礼逊》（Broomhall，1927）和《马礼逊其人其学》（Ride，1957）等3部传记。在纪念马礼